

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逻辑

董 昀¹, 延 缘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金融研究所, 北京 1007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102488)

摘要:金融文化是影响金融行为选择和金融活动取向的价值系统。不同类型的金融文化塑造不同特点的金融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两个结合”的产物。因此,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逻辑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总体框架中, 诚实守信是行为根基, 以义取利是行为目标, 稳健审慎是行为基调, 守正创新是行为动力, 依法合规是行为规则, 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内核。“第二个结合”不仅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道路根基, 也打开了我国金融学理论创新的空间。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理论逻辑;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5)03-0087-10

一、引言

金融是“国之大者”,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作为金融发展的“助推器”, 金融文化是国家金融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渗透在金融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中,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发展的立场、方向和成效。202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深刻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 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大力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1]171}这一重要论断表明,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唯有牢牢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 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进行创造性转化, 形成文明健康、向上向善、契合国情的金融文化, 才能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 引导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履行好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光荣使命, 为金融强国建设和金融高质量发

作者简介:董昀(1980—),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金融文化、宏观经济、金融与科技; 延缘(1984—),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5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项目编号:2025XYZD0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项目编号:DF2023YS28)。

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

需要强调的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作为金融发展的深层次动力源泉,金融文化不仅深刻影响金融政策的取向和金融实践的效果,而且事关金融理论创新的路径和成效。因此,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实践命题,而且是一个蕴含丰富学理内涵的理论课题。本文以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金融发展与金融文化熔于一炉,一方面从文化维度把握中国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金融发展之路的探索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塑造,以期从整体上阐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逻辑,推进学理化研究工作。

二、理论基石:“金融”与“金融文化”概念界说

顾名思义,金融文化既与金融紧密相关,又属于文化范畴,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对其进行准确的界说并非易事。纵览国内外代表性金融学教科书和工具书,金融文化一词并不多见。这恰恰表明,金融文化并非从书斋中创造出来的纯理论概念,而是植根于金融发展实践的鲜活表述。

(一)“金融”概念界说

在古汉语中,“金”与“融”二字连在一起的组合并不具备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金融”含义。在西学东渐大潮中,“金融”一词的经济学含义逐渐明确。根据黄达的梳理,19世纪下半叶以来,我国学者逐渐把通过各类信用中介机构开展的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金融”,包括涉及货币供给、银行信用、证券交易和商业保险等各类交易活动的行为^[2]。货币是融通资金的基本载体,金融活动与货币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究其根本,金融活动是已经发行到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有条件的转移过程。这一过程的顺利开展必须以面向未来的收益承诺为基本条件,而金融业的收益最终来自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植根于实体经济,满足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从技术和工具角度看,真实世界的金融活动是依托纸币、硬币、文档、股票、电子支付工具等各类载体实施的。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和制度安排,金融体系能够推动货币资金的跨主体、跨时空转移和信用的持续扩张,进而动员各类资本、促进资金融通、优化风险分担机

制,并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资金血液注入经济肌体中,引导实体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金融消费者作出的选择,还是金融从业者提供的服务,抑或是金融机构的运行发展,形形色色的金融活动都受到文化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

文化似乎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对“文化”概念进行精确界定极为困难。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生活环境中较为明确地识别周遭的文化因素,例如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信仰等。相较可以满足人们生物层面需求的各种物质力量而言,文化力量能够满足的是人们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核心是一套完备的价值系统,一个有用的工具箱,由相互联系的组织、语言、观念、价值、信仰、符号和习俗等要素组成。

仅就金融领域而言,文化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深刻影响着金融发展的方向、速度和绩效。金融学家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文化对于金融发展极为重要,研究金融问题需要结合文化和道德背景。下面分别从货币和金融两个层面举例说明。

第一个例子来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莫勒主编的《货币文化史》丛书。在该丛书的总序中,作者指出:“货币同时也是一种交流的媒介、一组工具——人们以此交换信息:不仅仅是价格信息,还有政治信仰、权威、忠诚、欲望和轻蔑。货币还是纪念过去的一种方式,它使人、制度、神灵和祖先之间建立的关系超越现在,迈向临近的、遥远的,甚至想象中的未来。”^{[3]1-11}这段论述揭示了货币的多重特性,展现了货币具备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历史等多种功能。这套丛书的案例与理论显示,货币的发展演化是一种富有文化想象力的实践创新,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例子来自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戈兹曼的专著《千年金融史》。该书强调,金融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跨时空配置资源的工具,更是深深植根于人类文化当中的一种行为,人类需要将金融置

于道德和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4]xv}。进一步说,金融发展的动力来自人类对文明社会的需求。在理性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活动和预期收益最大化行为的背后,有多种力量推动着金融的发展和运行,除了技术变革、制度创新,还有文化和道德。

这两个例子说明,理解货币金融行为不仅需要经济维度分析金融资源跨时空、跨主体流动的情况,还需要从人文维度展现金融与人类文化乃至文明之间的双向关联机制。一方面,金融通过特有方式塑造文明和文化。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各类金融业态通过资本的跨时空配置和风险的有效管理帮助人类社会解决在时间和空间维度面临的复杂经济问题,不断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化解经济社会风险,实现价值传承。在这一过程中,各类市场主体、社会主体通过货币金融活动建立起密集而复杂的关系,这些金融关系将各类社会群体连接起来,融入文明发展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金融浸润于文化之中,文化为金融活动确定基本立场和行为准则。无论多么复杂的货币金融活动,都要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故而文化因素必然深刻影响一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其中的道理在于,无论多么复杂的货币金融交易行为,其背后的决策和实施主体始终是人,个人的认知和偏好决定了最终方案,而后者又决定了金融行为的取向、路径和结果。进一步看,文化传统深刻而全面地影响人的认知和偏好。在货币金融活动中,人们通常会在各种备选项中选择一个他认为最好的方案。受文化传统差异的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域的人,往往有不同的价值观,对于各个备选方案的排序有不同看法,进而作出不同的选择。总之,文化塑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的选择和行为,不同的文化衍生不同的金融行为模式。

由此看来,金融文化就是蕴含在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道路中的,影响金融行为选择和金融活动取向的价值系统。一个国家的金融文化是一个相对稳定、连贯且持久的体系,但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社会思潮、社会制度等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个体系中蕴含着道德观、伦理观、世界观、价值观、行为准则以及方法论等内容,用于处理货币金融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如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金钱的关系,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金融与经济的关系,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关系等。概而言之,作为一套影响金融活动参与者行为的价值系统,金融文化要解决的是“怎么看金融”、“怎么干金融”这两大系列问题,其中包含信用观、财富观、义利观、风险观、创新观、法治观等具体内容。首先要搞清楚,金融有哪些基本功能,金融对人类社会有什么用处,金融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正确定位是什么,为什么要干金融工作?这些都属于“怎么看”的范畴。其次要进一步搞清楚,金融工作中什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优先做,什么往后放;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些则属于“怎么干”的范畴。

三、基本定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筑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基

纵观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发展道路均植根于自身的金融文化。不同文明、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民族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价值系统。因此,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各具特色,对于金融的功能定位也大相径庭。由此,世界各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金融发展道路。例如,个人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由自由市场机制驱动的金融发展“英美模式”;讲究秩序感和注重合作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特征的金融发展“德国模式”;等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塑造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金融是国之重器,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充分发挥了动员资源、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等核心功能,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和信用支撑,进而为

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开辟出来的,它之所以能够有力支撑现代化建设大局,之所以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发展道路有显著区别,是因为其关键在于中国特色。这条道路上的中国特色,自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培育。

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深厚积淀基础上形成的金融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要内在驱动力,铸就了这条道路的中国特色。反过来说,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逻辑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之中,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若要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精髓,从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形成途径和基本要义入手,显然是一条捷径。

(二)“两个结合”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会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6]。这一重大理论判断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两个结合”是开拓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最大法宝。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指导推动金融工作,同时又不断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金融理论与实践探索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内涵,从而开拓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简言之,理解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蕴含的中国特色,必须紧紧抓住“两个结合”这条主线。

在“两个结合”的基本要素当中,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及其蕴含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魂脉”,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支柱。

当代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应用场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创新土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蕴含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7][53]}这就要求我们在金融工作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使之带有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神韵,走自己的路,为解决好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服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脉”。在长期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中,包含着生动的货币金融实践和深刻的货币金融思想,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滋养^{[8][6]}。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的关键在于“结合”,铸就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密钥正是“结合”。更具体地说,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蕴含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有机结合之后形成的。这种结合不是拉郎配式的拼凑,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因此,作为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简单套用,也不是我国古代金融发展和金融思想的简单延续,当然更不可能是对西方发达经济体金融发展道路的模仿复制,而是一个从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有机统一的崭新生命体。

(三)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意蕴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在2024年1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作出精辟概括,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

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这“八个坚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学理化总结,展现了这条道路的时代特征和国别特色。这些高度凝练的理论表述是从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对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金融工作中的生动体现,反映了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风貌。培育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起点,就是从系统理解“八个坚持”入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丰富内涵以及其中的文化意蕴^[9]。本文从如下三个层面分别探讨“八个坚持”的文化内涵。

第一,“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我国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根本遵循。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具有严明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只有在建立共同理想信念的基础上有力维护中央权威,做到全党服从中央,才能确保党的路线得到有力贯彻执行。另一方面,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历朝历代正反两个方面经验表明,维护中央权威至关重要,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金融工作实践中把以上两方面的规律性认识结合起来,持续发挥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运用党和国家的信用,创造了有效动员和分配金融资源的体制机制,有力推动了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就使得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得以破除局部利益的藩篱,克服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避免金融政策的碎片化和金融活动的唯利是图,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服从于国家发展大局,朝着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前进,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实践证明,我国金融发展的重大成就,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最鲜明地彰显了金融发展道路的中国特色。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高度契合、相辅相成的。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无产阶级运动区别于过去一切运动的鲜明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民群众,为实现人民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强调要爱民恤民富民。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表述,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也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金融工作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富民厚生的经济伦理,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结合起来,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国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发展成果。我国金融工作的人民性与一些国家金融为资本服务、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本质截然不同,彰显了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鲜明特色。

第二,“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明确了我国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构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主攻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在经济循环中,由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构成的实体经济供求循环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这一循环畅通,经济就不会出大问题。因此,必须围绕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开展金融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金融一旦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宗旨,就会患上“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的“狂想病”,进而引发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不仅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但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的要旨所在,而且是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共识。仅从汉字的构成分析,“货”字底下的“贝”,就是我国早期的货币形态,“化”与“贝”组合在一起构成的“货”,便包含了物品交换和货币贸易的双重内容。司马迁《史记》中的名言“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生动地表明,货

币金融的发展植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的交易需要,服务实体经济是货币金融体系的天职。晁错《论贵粟疏》中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表述,以及《管子》中“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关于货币作用的表述则进一步表明,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十分重视正确处理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致力于运用货币金融工具实现经济治理目标,反对将货币金融置于实体经济之上的观点。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经由“第二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形成了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10]308}由此可见,在经济和金融的循环流转中,实体经济发展是根本,金融服务是支撑,二者之间有着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之中。金融血脉的畅通归根到底是为经济肌体的健康发展服务的,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即“以义取利”。具体而言,只要守住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初心,金融体系的创新活动就有望通过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的改进,带来资源配置媒介、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等金融功能的优化。以此为支撑,各类经济主体不但可以实现跨期平滑消费,而且可以聚集各类要素资源从事创新创造创业活动,消除生产性融资的约束,推动经济结构跃升和国民财富增长。反过来,有了强健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金融繁荣就不会是“虚胖”,而是迈向质量优先、效率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业的收益归根到底来自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中,金融业可获得稳定的预期回报,资金流亦将趋于稳定。

“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体现了稳健审慎的鲜明风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筹经济发展和风险防控,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风险特性,抓住关键,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金融风险防控的关系。

既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又要抓牢经济发展主动权,通过做大蛋糕、积累资产为化解金融风险隐患提供充足的弹药,实现主动安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在金融工作中始终坚持一手促发展,一手防风险,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力维护了金融稳定,助力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表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蕴含的中国特色,是我们道路自信的重要源泉,是当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在金融工作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方法论,构成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重大原则。

中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大局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两大目标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坚持辩证思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至关重要。在辩证思维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契合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辩证思维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事物的多面性、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无论是儒家的“和而不同”,还是道家的“有无相生”,或者法家的“矛盾之说”,都展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方式。经过长期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有机结合,形成了在金融工作中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金融的改革、发展、稳定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始终注重从三者的辩证统一过程中把握金融发展演变规律,协同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短视化。“八个坚持”中的后四条,都是这一方法论的具体表现。这些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哲学观和有机主义方法论进行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规律性认

识,又一次生动体现了“两个结合”对于塑造中国特色的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其一,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强调要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作为基本取向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改革红利的激发为金融创新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并且为金融活动提出“依法合规”这一基本要求。其二,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用改革的办法实施金融结构调整,激发守正创新潜能,破解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其三,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就是要将安全作为开放的前提条件,将开放作为安全的必要条件,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提升金融业国际竞争力,为维护金融安全提供更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其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就是要以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为基础,以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为方向,在稳健审慎的前提下实现稳中有进,以进促稳,协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稳定。

从以上分析可见,“八个坚持”既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生动体现,也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的滋养。其中的每一条都是经由“两个结合”开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理论结晶,包含十分丰富的文化元素。既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元素,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又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意蕴,那么,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就成为我们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完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

四、理论内核:“五要五不”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内容归纳为“五要五不”,即“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是内嵌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一套逻辑自洽的核心价值系

统,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金融观,构成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内核。这套环环相扣的价值系统围绕各类行为主体的金融活动开展。其中,“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行为根基,“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是行为目标,“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是行为基调,“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是行为动力,“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是行为规则。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既有各自的侧重点,又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论内核。这五个部分之间的关联机制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自洽的理论逻辑。

第一,从行为根基看,“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凸显了信用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契约精神、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在金融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基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旦诚信底线被突破,必将付出沉重代价。这条底线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必须牢牢守住。我国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信为先的文化传统。北宋时期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我国诞生和推广,就与百姓和商户尊重契约、恪守信用的行为准则密不可分。放眼世界,在欧美国家的金融革命中,无论是国债规模的扩张、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形成,都起到了有力扩张政府与私人部门信用的作用,以信用扩张推动了资本积累,催生了工业革命。在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我们要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珍惜信誉,加强行业自律,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失信成本,以完备可靠的信用体系支撑金融高质量发展。

第二,从行为目标看,“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了什么目的从事金融工作”这一事关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为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指明了行动目标。进一步看,“以义取利”通过阐明“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明确了金融活动“义在利前”的目标优先序,同时强调“义”与“利”的兼容性,为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开展金融活动提供了价值导向。金融具有功能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在金融领域开展义利之辨就是要处理好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关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耻”,将“义”放在“利”之前乃是君子之道,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则向来为君子所不齿。至于“义”的内涵,“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千千万万民众之利汇集起来,就构成了义,这便是国家的、社会的整体利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金融业追求的“义”就是坚持金融的人民性,适应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努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资金血脉畅通,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充分发挥金融功能、承担行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可以分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红利,从而获得可持续的收益,这便是金融的“利”之所在。在金融工作中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要使营利服从于功能发挥,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以义取利”意味着,践行国家大义、履行金融功能是金融行业获取利益的根本依托和必由之路,“义”与“利”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而是相互契合、辩证统一的。在发挥金融功能,助力实现最大多数人整体利益的过程中,金融业也将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获得必要的利润,不断发展壮大。也就是说,“利者,义之和也”,“义”与“利”是高度统一的,坚持行正义、走正道,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行事,最终可获得持久的、真正的“利”。

第三,从行为基调看,“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重在处理稳与进、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以“急功近利”为禁区,为从业者正确把握开展金融活动的力度与节奏提供了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金融业要实现基业常青,就必须在经营活动中坚持稳健审慎的原则,既要看当下,更要看长远。国际上那些基业常青的金融机构都做到了这一点。反过来看一些金融界的“百年老店”,一旦在经营观上偏离了稳健审慎原则,就可能急功近利,给自身发展带来无尽的隐患。例如,成立于19世纪的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是20世纪初全球金融界的“巨无霸”。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银行不顾自身有限的风控能力,采取过度的业务扩张战略,通

过融资、采用新型金融工具等途径力图实现跨行业和跨国扩张,结果扩张速度与风险管理脱节,导致坏账不断积累,濒临破产^{[11]167-188}。为了切实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我们要充分汲取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引导金融行业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坚持稳中求进,避免急躁冒进,确保风险承担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稳”是为了求“进”,既“稳”又“进”则是一种良好的金融发展格局。要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把握好快和稳的关系,坚持稳字当头,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保货币金融活动稳健有力,推动金融发展行稳致远。

第四,从行为动力看,“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体现了中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心使命。在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大众的方向指引下,“守正创新”将激发金融从业者的创新创业和创造活力作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源泉,回答了金融发展的取向和动力问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富有创新精神,例如,《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明创新必须持续不断、日日精进;《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周朝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对礼乐制度的要求。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不断得到阐释和弘扬。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守正,是为了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为什么创新的问题。创新,则是实现守正的根本动力,是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的途径和手段。进入新时代,我国金融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不断实现产品创新、场景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在支付、信贷、理财、保险等方面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和中小微企业的需要,有力提升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普惠性。这就是守正创新的一个生动案例。在金融强国建设征程上,要把握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引导金融行业在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前提下,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便利人民群众推动金融创新,通过创新更好践行初心使命,统筹推进经济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守正创新工作的重点是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力戒脱实向虚,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

第五,从行为规则看,“依法合规,不胡作非

为”强调法治精神和法律法规对金融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通过加强法治建设和完善制度结构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胡作非为现象,用铁的规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金融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金融交易涉及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讲究依法合规,必须建立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有禁必止,违法必究。唯有如此,方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为了给金融强国建设保驾护航,党的金融工作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把该扎的篱笆扎牢、该建的防火墙尽快建起来。要完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运行、金融治理、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规范金融运行。具体看,一方面要将依法合规作为金融活动的底线要求,及时推进金融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坚决惩治违法犯罪和腐败行为,铲除滋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土壤。另一方面必须要求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严格遵纪守法,遵守金融监管要求,自觉在监管许可的范围内依法经营,要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完善制度和政策框架,让撞红线、冲底线和游走于法外的人付出沉重代价,不断增强金融行业的规矩意识、法治意识。

根据上述分析,作为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在逻辑是:在守牢信用基石的基础上确立行为目标,随后把握工作基调,激发动力潜能,最后明确行为规则。这五个环节共同构成了一套覆盖金融活动全过程的价值体系和金融工作方法论。扩展来说,诚实守信是金融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守不住这条底线,金融活动便不可持续。以义取利规定了金融活动的目标和路径,只有杜绝唯利是图,使营利服从于功能发挥,才能使金融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稳健审慎是金融工作的总基调,力戒急功近利,做到稳中有进,才能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守正创新是金融活动的动力源泉,守正是金融的初心使命,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根本动力,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这一宗旨开展金融创新,避免脱实向虚,就能为继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提供持久的动能。依法合规为开展金融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严惩违法犯罪者,

保护遵纪守法者,弘扬法治精神,是维护金融秩序,确保金融安全的根本举措。

五、结语:立足“第二个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永无止境的。这条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继续向前推进。金融文化是金融发展道路的深层动力,为了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我们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两端着手发力。一方面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高质量发展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文化根基,形成能够系统揭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实践探索角度看,要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作为有力支撑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纳入金融强国和文化强国战略中加以系统谋划。一是要不断健全党对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工作的领导机制,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金融系统、经济工作部门与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协调联动,形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高效配合的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工作领导机制。二是从理想信念塑造、价值观培育、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和法治环境优化等多个层面着手,在金融行业塑造向上向善的良好文化氛围,将“五要五不”融入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积极投身金融强国建设事业。三是在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始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培养一支既精通金融业务、熟悉金融规律,又有坚定政治品格 and 良好职业操守的强大金融人才队伍。

从理论创新角度看,我们要善于从五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也要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金融篇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熔铸古今、会通中西,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精髓以及西方金融学理论的有益成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

通起来,同我国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金融学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夯实中国自主金融学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哲学思考和金融思想与当代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与人类一切金融学知识的精华紧密联系起来,逐步构建起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直接来源于当代中国实践、充分借鉴国外经济金融学理论资源的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2]黄达.金融[J].金融评论,2009,1(1).
- [3]莫勒.货币文化史Ⅵ[M].陈佳钊,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2.

[4]戈兹曼.千年金融史[M].张亚光,熊金武,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J].求是,2023(17).

[6]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1-01.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年谱: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8]董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历史、理论与现实逻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9]张晓晶,董昀,李广子,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J].金融评论,2024,16(1).

[10]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11]姜建清.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1[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ng Yun¹, Yan Yuan²

(1.Institute of Finance & Bank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2.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Financial culture constitutes a value system that shapes people's choices in financial behaviors and orientations of financial activities. Different types of financial cultures forg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th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rves as the "root system" for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tself is the product of the "Two Integration".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ntrinsically embedded within the grand logic of China's distinct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th. 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this financial culture,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form its behavioral foundation, pursuing profits with integrity constitutes its operational objective, prudence and stability set its behavioral tone, preserving fundamentals while driving innovation provides its motivational force, and legal compliance establishes its regulatory norms collectively forming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financial cultur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has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foundational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unlocked new potential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financial studies.

Keywords: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log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王宇恒)